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九冊

第二次中日戰爭

正中

行

包遵彭
李定一
吳相湘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九冊

——第二次中日戰爭

正中書局印行

包遵彭
李定一
吳相湘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九冊

——第二次中日戰爭

正中書局印行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六日第六版

第一輯
第九冊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二期中日戰爭

全一冊 基本定價一元八角

(外埠加運費)

編者 包李 邊定 湘一 彭

發行人 黎元 正中 書局

(臺灣臺北街路十二號)

海外總經銷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油麻地北街七號)

海風書店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深田一丁目六番地)

東海書店

(日本東京都左區中田町八九番地)

叙 言

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之稿的，不僅在彙輯若干論文以供閱讀而已，實另有深遠的寓意。

數十年來國人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並非不辛勤，但成績却並不如理想，除史料浩瀚無涯際與史事紛雜難解釋的原因而外，研究者不易超脫時代環境所加諸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儘管成績不如理想，但總是一個時代學者們心血的結晶，它應該受到我們的重視與愛護，它值得被提出來作為今後研究者的里程碑。

整理史料以廣流傳，整理史料以利閱讀，審訂史料以辨真贋等事，僅僅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但最重要的還是憑藉這些史料去瞭解歷史的真相，闡釋史事的脈絡，尋求歷史的知識，纔是歷史研究的真正的。我們要結算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成績，當然祇有從他們的論文中去找答案。研讀過這些論文之後，目前從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士不致陷於無處着手或枉費功夫的苦惱中。

要周覽這些學術論文確非易事，因為它們多散見數十年來各種期刊之中。經此次大動亂，中華民國現在所保存者，幾已多成孤本，存留大陸匪區者，則遭有計劃之銷毀。我們豈能任這些可珍貴的學術成果湮沒而不能流傳？本論叢所輯的雖未必完備，但循此途徑，必可達到保存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成果，並為今後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樹立里程碑的目標。

尤有進者，共匪正在大陸瘋狂進行廣造中國歷史的工作，特別重視的當然是中國近代史。他們一方

面註印經過刪改後的史料，一方面歪曲這些史料，撰寫成符合俄寇利益的歷史。進行這項工作時，必須先消滅以往學者在正常情況下的成績。羅爾綱被迫完全否定自己從前的研究結論，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參看本論叢第一輯第四冊導論）。這替例證，更加强我們要編纂本書的決心，更警惕我們認識自身責任的重大。

在編纂的過程中，我們對以往國人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曾略加檢討。所以每一冊的前面，都撰寫導論，除掉介紹內容外，並將我們對該問題研究的見解提出。

創造時代者必先瞭解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真相與淵源。祇有在明白過去苦難的所由來以後，纔可能為將來帶來新幸福；沒有不接受前人經驗的民族能繼續自由獨立地生存在世界上，締造將來的明鏡是對過去淺薄的反省。我們渴求歷史知識的目的在此，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的知識，因惟有它最能滿足我們這方面的需要，惟有它最能解除我們的徬徨與空虛。所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僅應當正視他們這個時代使命，而且必須集中他們的研究工作，努力去達成這個目標。

凡 例

(一) 本論叢每輯分十冊，每冊約十五萬字至二十萬字。以一專題爲中心，選輯近四十年來我國學者專家已發表的有關論文或專著節錄。

(二) 本論叢爲篇幅所限，故各論文原有之註釋除特別需要者外，均刪去不錄。

(三) 每論文末均註明原載書刊名目發表年月，讀者有需要時，可自查對。

(四) 本論叢第一輯祇選輯國人用本國文字所發表之論著，本國學者用外文撰寫之論文或國人翻譯外國學者之論著，均不輯入。

(五)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在臺灣省印行之有關論著，爲避免重複計，均不選入本論叢第一輯中。本書編者有關論著，亦不輯錄，只存其目，以便儘量容納各家論文。

(六) 本論叢之目的在保存原作者之見解，故對所輯各論文之論斷並無贊同或反對之意。

(七) 本論叢編輯過程中，承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中國文學系圖書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館編輯委員會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陽明山莊圖書館等及其私人藏書家給予協助，謹此誌謝。

導論

中國和日本，由於歷史的淵源與地理的接近，號稱同文同種兄弟之邦。按照正常發展說：開誠相見，和平相處，同謀亞洲的安定進步，並求對世界文化能有更大的貢獻，才是真正合作共存共榮的大道。但不幸近六十年來竟因日本軍閥一再發動侵略戰爭，致使兩國之間兩次兵戎相見，結果坐讓俄羅斯帝國主義者獲得意外的利益。

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九五年）與第二次中日戰爭（一九三七——四五五年）之間，相距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日本軍閥陰謀征服中國的步驟，一天一天的緊迫，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向我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就是它心目中將中國視作附庸的野心總暴露。自後以至濟南五三慘案、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均為達成其野心的有計劃地一貫行動。

六十年來，日本軍閥用以侵略中國的口實，就是所謂「生存空間」的說法，甚至七七事變發生以後，美國羅斯福總統著名的防制侵略演說發表了（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自本外務省情報局長河相達夫尚對歐美新聞記者肆其詭辯，重彈一貫謬論，所謂「有資源國對無資源國拒絕絕對既得權利讓予，則槍戰爭外尚有解決途徑乎」——簡直就是明目張膽地說惟有藉戰爭以為實現其野心的手段。實則其「經濟」的理由，殊不足作為對華侵略的根據，因為它所有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困難都是它對外侵略慾所造成的——「東北中日人口關係論」和「最近二十年來日本對華貿易政策的分析」兩文，不僅對於日本軍人常用以

欺世的謬論，給予事實上的關斥，並可供世人了解日本發動對華第二次侵略戰爭的真正原因：實在日本企圖淪中國爲其附庸，獨占中國一切資源，以爲其進一步稱霸世界「八紘一宇」的資本。

日本軍閥侵華另一慣用的飾辭，就是所謂「共同防共禦俄」。但其言不顧行，事實上祇有更便利俄帝及共匪的外交活動與政治宣傳。因爲這種「藉指責他人以掩飾本身侵略」的策略，一八五一年以來，俄人即已應用於中國了，其經驗的豐富與手法的巧妙，都不是日本軍人所能比擬的。故早在「九一八」之前與其發生之初，我國輿論界即曾鄭重忠告日本（「再論日本大陸政策」、「世界大局關鍵在中國」）：「不要口是心非爲淵驅魚。不幸日本軍閥如瘋如狂，悍然不顧，仍按預訂計劃發動並擴大其侵略行動！——就戰後公開資料顯示：俄帝爲充分利用此一情勢，使日本軍閥成爲「替他自火中取栗子的傻瓜」，乃在遠東推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狡猾双重策略。同時更於歐美散佈失敗主義言論，藉以削弱美國與歐洲國家抵抗俄國這一遠東陰謀的意志與力量。」「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一文根據歷史常識指出失敗主義的錯誤：「爲禍爲福，全靠政治家能不能充分明瞭這個新局勢，能不能充分運用它，最重要的關鍵還在於日本的能不能有一種澈底悔禍懼禍的決心」？不幸太平洋學會當時早已被俄共有計劃地滲透控制，成爲影響美英朝野政策與輿論的中心，致使這一「忠告」未能在美英發生影響，日本軍閥更益無忌憚，終於演成大戰。——當茲「九一八」廿五周年紀念日，國際政治家——尤其日本朝野面對「茫茫大陸爲時代惡潮蕩捲而去」的現實，應該接受這一歷史教訓了。

早在辛亥革命時，日本軍閥即曾企圖出兵進占東三省。嗣因列強之反對，日本乃轉向清廷表示願協

助其鞏固現政權，唯須以東三省讓予日本作協助之酬勞；同時日人又與革命軍領袖洽談；願協助在中國南部建立一共和國，而之以置於日本保護之下，並須給予日本以若干路礦權利；當經革命軍嚴詞拒絕。而其與清廷之交涉，復因英國之干涉，未能成功。自後，這種將中國「分而治之」以便逐步吞併的陰謀，即隨國際局勢而時緊時弛。民國十七年夏，田中義一主持日本國政；一方面出兵我山東省，公然以武力阻撓我北伐軍之進展；一方面又與蘇俄史達林密商割裂我國東三省成立「自治政權」計劃，既得史達林之同意，民國十八年八月俄軍且開創以武力進犯東三省的先例，於是日本軍人得到鼓勵，「九一八」事變遂以演出，第二次中日戰爭，同時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從此揭開。

不論日本如何詭辯，「東三省永為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九一八及其後之一切日軍行動都不能認為自衛手段」、「滿州國並非真正及自然運動所產生，乃日本軍人憑藉武力造作之工具（註一）」這在「國際聯合會調查團報告書」中就早已定讞了。但國際聯合會在報告書發表以後，沒有進一步採取比較有力行動以制裁侵略者，因之，日本老羞成怒益無忌憚，竟於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宣佈退出國際聯合會，從此一意孤行，更加緊經營東三省使成爲其征服世界的根據地。「日本大陸政策之大進展」及「十年來暴日對東北政治統治的總剖析」，足供了解日人當時的手法與目的。所謂協和會的根本精神在「排除反國家思想乃至反國家運動，以期完成民族協和之理想鄉，同時最後目標爲將民族協和運動推行於混沌狀態中之全中國本土，擴充至全東亞」。尤可見其得意忘形毫不諱言其陰謀步驟之情況——事實上：日本軍閥當時於此確是「劍及履及」。換句話說：在民國二十二年春，日軍進一

步侵占我熱河省全境，宣稱「滿洲事變告一段落」後，其政治分化工作就已在我冀察豫晉綏五省積極展開，企圖由此造成第二個「滿洲國」，以爲「協和運動」推行全中國的首一步驟。

因爲日本朝野對於中國有一基本的信念，他們始終認爲中國各省地方的軍人是中國封建社會關係的殘餘，還沒有失去封建的獨立性。因而，在日本對華政策上，仍有利用各地軍人使中國分裂的餘地，縱事實上不能使這黃河流域五省完全脫離中央政府而獨立，至少總可使其在半自治的狀態之下「特殊化」，成爲日本軍閥暢所欲言的所在。於是所謂「華北五省明朗化」，就被日本軍人作爲當時政治工作的總目標。

但由於我國民衆意識的日益增漲，終使一時風起雲湧的華北聯省自治運動惟有偃旗息鼓。而「暫時擱置政治的積極工作先由經濟方面入手」的呼聲，又自日本發出了。

按照日人的看法：政治分化工作既遇最大的阻力，則對華政策自不能不轉入經濟發展的策略。在經濟提攜的名義之下，既可避免中國的反對，且在經濟發展的原則之下，日本援助華北冀察當局，則冀察兩省自有日漸傾向日本的可能。所以「經濟提攜」的結果，表面可以發展到冀察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鬭爭，而不是日本與中國的正面衝突，冀察自然成爲「特殊化」。

基於這一策略，日人會一再以建築鐵道以及其他中日合辦事業的具體借款計劃利誘冀察當局；同時又以「走私」爲手段，迫脅我國當局就其範圍——但中華民族團結圖存的意識終又阻遏了日本的陰謀。於是「軍力克服論」又在日本國內抬頭，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由是發生——

「走私問題」與「七七回憶錄」可供了解當時演變的概要——同月十一日，日本政府發表加瀨重兵辭職華北的聲明，並召集其國內政界財界言論界請求一致援助政府；且不顧我國當局「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之嚴正表示，繼續擴大事態；進占我北平天津後，又於上海製造「八一三事變」；其企圖加強壓力迫使我國屈服的情勢異常顯明。至是，我國政府委曲忍痛以求和平的能耐已達最後關頭，惟有率領軍民奮起作全面之抗戰了。

先是，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統一全國之前，蔣中正總司令曾一度東遊日本（民國十六年十月）訪問其朝野，誠懇說明中國日本未來的關係，將決定東亞前途之禍福，希望兩國國民能由自動的自覺的精神團結，達到切實的提携與根本的親善。同時更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坦誠懇談，切望其認識國民革命之性質，放棄對華武力干涉及「製造奴隸」政策。不幸田中毫無誠意，每聞蔣氏談及統一中國之語輒為之變色，甚至明言「為何不以統治長江為宗旨而急於繼續北伐」？其不欲改變過去對華「分而治之」政策之情盡見乎詞（註二）；逮民國十七年五月田中出兵山東製造五三慘案，企圖阻撓我北伐軍進行的陰謀未得逞，中日關係却從此急轉直下，日本軍人的狂妄氣焰也更甚了。

當五三慘案時，我國軍民受盡日軍的侮辱與屠殺。但蔣總司令深知日軍陰謀在破壞我北伐統一的大業，因特告誡全軍將士說：「圖報國仇，謀雪國恥，要使中國不受帝國主義的欺負，真正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效法往哲先賢的志節，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國恥必可洗雪」。這一段話，自「五三」以至「七七」實在我國軍民復仇雪恥的南針。（見「忍

天下之所不能忍決常人之所以不敢決」。近三十年來的事實不僅證明這一南針的絕對正確；同時也給我們以更大的啓示，使我們深刻認識：漢唐初葉對外「屈以求伸」政策，不惜以黃老之術通於兵，圖自強而不輕試其鋒，終於造成國史上的黃金時代；而南宋——尤其清季以來的虛懦士論，實在債事誤國太甚了。

「九一八」事變既暴露日本無厭的野心，「一二八」淞滬戰役則證明我民心士氣已大有可用；因之，我政府當局益認識統一與建設之觀念，實爲抵抗日本侵略最有效之對策，而爭奪鞏固統一完成建設所需之時間，則爲實行這一對策之大前提。於是忍辱負重長期抵抗的最高原則就在這時正式公佈了——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二中全會宣言鄭重昭示國人說：「國難日深，正本黨見危救命之時，方今之急，首在禦侮……政治之改進，不特關係目前禦侮，抑且爲國家雪恥圖強之大本……外交與軍事相輔而行，尤須衝情審變，由統籌民族利害而決策。中央既定長期抵抗之決心，同胞應爲國家存亡而奮鬥：勿虛懦、勿懼葦、勿輕於樂觀、勿易於悲觀，應以沈着毅勇之精神，表現民族最高之意識，舉凡前此紛張之派別，繁複之意見，全融鑄於偉大民族意識之中，國家乃能有救，民族復興之關鍵，端在是矣」。同時又決定以西安爲西京，洛陽爲行都；（並有定重慶爲陪都的計劃。）並特任蔣中正氏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寄以國防之重任。蔣氏以國都既有根據，持久抵抗之計劃，較易實施，臨危受命，毅然出任艱難，於是國防計劃之實施，持久抗戰之準備，事機萬端，從此發軔（詳見袁顯光著「蔣總統傳」及張其鈞著「黨史概要」（又名中華民國史綱）等書）。

應該特別指出的：即當蔣委員長着手實施禦侮大計的種種步驟時，國內若干省區還有一些不明大義

的軍人政客，江西省境更有爲虎作倀的共匪；同時最重要的就是日本軍人對我政治經濟侵略的工作也與時俱進步步加緊。因之，蔣委員長一方面兼攘外必先安內原則，集中軍力剷除共匪；一方面更發起「新生活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並倡導全國總動員，舉辦廬山訓練團及全國高中以上學生集中軍事訓練，加強童子軍教育等以改造國民的惰性及不團結自私的積習，鼓舞民族精神的復興。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蔣委員長在廬山訓練團詔示學員說：「我們這時來準備國防，添製武器，不僅我們的國力趕不上他，日本人也決不會容許我們從容準備加緊製造；惟有拿我們的精神戰勝他的物質，發揮我們的智力來抵抗他的武力」。他要占領我們一省至少需時一月，十八省即需十八個月，國際的變化還了得——這就是後來全國一致抱持的「精神能勝物質」信念以及「用空間換取時間」的最高戰略指導。八年的抗戰證實了這一信念與這一戰略指導的正確——「抗戰兩年之回顧」、「抗戰經過簡述」、「四年來敵我戰略戰術的總檢討」、「戰略的理論與實際」都是抗戰正在進行並且尚在獨力抗戰時發表的文字。在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當時人對於這一信念是如何的堅定，對於這一最高戰略指導是如何的信賴擁護。可以說：這就是抗戰所以獲致最後勝利的最大憑藉與原因。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所重所先尤在信字；古代中國平時政治需要如此，近代國際戰爭歷史更證明這三大端的重要性。「抗戰兩年之回顧」中指出：「我們領袖的昭示，無一不成爲虛語，自然我們越來越自信」。大前提既堅強樹立，全國國民對於抗戰所需要的兵源糧源，自然踴躍應徵爭先輸將了。「徵兵制度的建立與實施」、「論大學生應徵服役」、「田賦徵實與軍糧民食」各篇足

供了解我們廣土衆民支持八年長期抗戰的情況之一斑。

「日本與李鴻章戰」——這是外國觀察家在甲午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時對於滿清朝廷與全國國民不能敵愾同仇一致對外的一種譏評。但這次神聖的全面抗戰將過去一切的譏評恥辱洗刷了。除開上舉的數篇文章可以說明「全面抗戰」情況之一斑以外，「民國二十七年以來之國民參政會」及「內政的重要與革」，更是進一步指陳當時朝野聲氣相通合力邁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目標的實況。至於「敵僞破壞我法幣情形分析報告」則可反映這「全面戰範圍之深廣」——在這一曠代偉業的新形勢下，我國人若干積習——如千百年相沿的「文人相輕」也被這大時代潮流沖洗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就是一具體的例證。同時這一碑文也充分顯露我文化教育界對於抗戰勝利的歌頌與建國大業的信心。所謂「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爲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實在是這次神聖抗戰歷史評價的代表作之一。

先是，當「七七」事變以後，日本軍閥妄言：「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意謂重兵壓境決可迫使中國屈服。但「八一三」後我展開全面抗戰，南北戰場擴大，日軍即陷於無所不衆無所不寡之困境，南京保衛戰展開以前，即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重申長期抗戰決心，並謂今後爲期以更廣大之規模領導軍民抗戰，特遷移重慶辦公。同時日人經由德國脅我作城下之盟的企圖完全粉碎！武力征服既不可能，日人又轉採以華制華及分而治之政策：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驅使漢奸在

北平組織所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復於南京成立所謂「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均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但不久即發現此批漢奸均已不能發生作用，尤其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早已深入全國人心，「紅黃藍白黑」五色旗之復出，不特不能號召，且引起熱愛祖國之中國人士的反感，於是日人政治分化工作對象遂轉向於有野心無宗旨的汪精衛。

「蔣總統傳」的作者董顯光博士曾謂：「當汪氏於重慶仍任職政府時，日人究如何與之接觸，外間固無從知之」（中冊第三一七頁）。張其昀氏於「黨史概要」（第三冊一三七〇頁）中則指陳：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下旬（武漢會戰前），蔣總統即已覺察汪不自然之態，料其必有異動——就本書編者所見勝利初期繳收汪逆文件，則汪逆在武漢會戰前確曾有親筆函稿致日本近衛文麿，其中有謂「近常由意大利使館得聆閣下及貴同僚之意見，知貴方主要之念慮，為將來中國對日本之態度，且聞貴國切願息爭言和，唯須得有相當保證將來中國必採對日友好之政策」（國史館史料目錄715/87）。足為日汪勾連途徑提供一新說明（註三）。

研究日本軍閥「以華制華」政策及其卵翼傀儡政權的詳情，是現代世界歷史家及國際政治家頗感興趣的題目，因為這種研究是有助於了解當今遠東局勢的——現在中國大陸不是又出現一個俄國的傀儡組織嗎？它們與日僑之間究竟有什麼兩樣呢？——美國史丹福大學即曾就其胡佛圖書館所藏資料編成「有關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卵翼下中國政府之書目」（Japanese 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 1937—1945.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Copied from materials 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the

Hoover Library, by Fredrick W. Mot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其書導言中曾以戰後中國學者沒有產生一冊有關這一問題的著述爲言。這確是令我國人慚愧——本書選錄「汪逆偽組織之剖視」、「日汪僞約十論」、「日寇對華新政策的分析」三文，都是戰時發表。編者顧鄭重指出：這些文字的論據都是值得注意可以信賴的。因爲編者曾就國史館收藏汪僞文件加以檢閱比對——這些汪僞文件幾乎全是當時原件，且多爲汪逆手筆，如日汪「調整邦交會議」十六次會議紀錄、「關於大東亞會議最終議事錄」、溥儀致汪「國書」、希特勒致汪文書、汪致王克敏吳佩孚函、周逆佛海致汪函等均當時正本或手稿。在這些原始資料的優良憑藉下，我國學者如果能致力於此，應該有良好成績貢獻於世人的。編者續望由此促起各方面的注意：這是「侵略必敗漢奸必亡」的最近最著的事例，「殷鑒不遠」，研究的成希是大有助於我們反共抗俄鬪爭必勝必成信念的。

近二十五年來：我東北及中原各省同胞不幸兩次身受「亡國奴」的苦痛。這是最令人傷心的。「日本在華的三大奴化機關」、「敵寇對侵占區之奴化教育」兩文，說明日人當時的手法，足資警惕——而今俄寇共匪在我神州大陸組織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現已正式暴露名稱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及所謂「中蘇友好協會」，這究竟與所謂「新民會」「協和會」有甚麼分別呢？顯然地：現在俄寇共匪的手法是更變本加厲了：所謂「思想鬪爭」「清算」「洗腦」以及「三反」「五反」等等，比之日本軍閥的手法又不知毒辣若干倍了。

應該鄭重指出的：自「七七」以至「珍珠港事變」（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四年之間，我國始終

是站在反侵略陣線最前面孤軍奮戰。但如上文所引錄的：當時我們不僅毫沒有感覺氣餒，相反地且「越來越自信」了。珍珠港事變發生後，中美英聯合戰線實際形成，我蔣委員長經盟國推選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美空軍陸軍比翼併肩打擊侵略者，終使日軍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我在南京接受日軍投降，於是自甲午戰爭以來「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業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就是說：原被日本占據的臺灣澎湖及東北各省土地都回歸祖國懷抱了！上距「五三」慘案後我蔣委員長決定「忍辱負重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復仇雪恥」的國策，不過十七年！

事實上：這一神聖的抗戰不僅洗雪了過去我國對日本的一切屈辱，同時也廢除了與其他各國間的不平等條約。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日中美、中英平等新約的簽訂，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新的一頁之開始，是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編者正輯錄有關不平等條約內容及國人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經過於本書第二輯中。在這裡謹錄國民政府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二日命令，以誌其盛：

「吾尊重主權，原屬國際之公誼；獨立平等，尤為建國之始基。溯自清季以還，因吾國勢之不振，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迄今已達一世紀之久，愛國志士呼籲奮鬥，未嘗一日忘此。國父遺囑之詔示，亦視不平等條約之廢除為最短期間應促實現之急務。

「現本府已與美國及英國政府分別簽訂條約，廢除英美在華之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之特權，並各廢止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締結之辛丑條約。同時英美兩國政府宣布：上海與廈門公共租界內之行政與管轄權應歸還吾國，租界內之所有權利亦均放棄。此與英國簽訂之條約中：英國政府更放棄天津及廣州租界內之各種權益，此外英美兩國復將其在我國內河與沿海航行之權一併取消。